

考文垂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理念和实践

罗清云 刘 成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考文垂大教堂是战后考文垂倡导和缔造“和平与和解之城”的建设成果,它构建了一种具有和解特色的战争创伤城市的重建模式。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对考文垂实施了“夷为平地”式的大轰炸,著名的考文垂大教堂被炸毁。大教堂“以德报怨”,提出“和平与和解”的非暴力理念,促使考文垂摆脱传统受难者的叙事模式,塑造了战后考文垂城市的和平形象和发展定位。大教堂以和解的方式治愈战争创伤,通过“和平重建”“友好城市”“铁钉十字架社区”等和平计划,推动英德两国关系的改善,促进战后国际和平环境的营造。大教堂所倡导的战后和解行动并不意味着对创伤历史的无视和遗忘,而是通过和平教育及和平行动网络的构建,将战争记忆的苦难叙事转化为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追求,践行“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的和平学理念。面对战后考文垂社会冲突和发展问题,大教堂拓展“和平与和解”的实践范畴,主动承担“问题解决者”的责任,推动城市内部种族和解,促进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理念及实践,为其他国家创伤城市的战后重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照。

[关键词] 考文垂大教堂 英德和解 宽恕 和平学 和平城市

1940 年 11 月 14 日,纳粹德国空军对考文垂实施了毁灭性轰炸,考文垂大教堂^①(以下简称大教堂)被炸毁。考文垂战后的城市发展摆脱了传统的受难者叙事模式,走上了积极的和平建设(Peace-building)^②之路,为考文垂赢得了“和平与和解之城”(City of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的国际美誉^③。从考文垂城市史视角研究大教堂的战后发展,西方学者大多侧重从建筑史、宗教社会史和战后发展史视角论述大教堂和平建设的具体实践,较少关注大教堂的和平建设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影响^④。新大教堂建筑设计师巴兹尔·斯宾塞在多部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大教堂的重建细节,而国内学界有关考文垂的研究成果很少,尚未发现对大教堂进行专题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⑤。本文主要利用考文垂当地报刊、城市档案和大教堂神职人员专著等文献资料,对战后大教堂的和平建设理念和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20&ZD24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国考文垂创伤记忆与和平构建的互动研究”(19BS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清云(1989—),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史、和平学。

① 考文垂大教堂(Conventry Cathedral)前身为考文垂圣米迦勒教堂(Church of St Michael),始建于中世纪。1918 年,该教堂被确立为考文垂教区主教座堂,即圣米迦勒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Michael),又被称为考文垂大教堂。

② 和平建设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冲突研究、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等众多领域。参见 Oliver P. Richmond, Gezim Visoka,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eacebuilding, Statebuilding, and Peace 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③ Jeanne Kaczka-Valliere, Andrew Rigby, “Coventry—Memorializing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Peace & Change*, 2008, 33 (4), pp. 582–599。

④ 肯尼恩·莱特、奥利弗·舒格拉夫等多位神职人员曾出版过个人回忆录、日记,详细介绍了“和平与和解”理念的提出、国际和平网络构建过程等大教堂战后和平建设的具体内容。参见 Basil Spence, *Phoenix at Coventry: the Building of a Cathedral*, London: Geoffrey Bles Ltd., 1962; Basil Spence, Henk Snoek, *Out of the Ashes: A Progress through Coventry Cathedral*, London: Geoffrey Bles Ltd., 1963;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H. C. N. Williams, *Coventry Cathedral in Action*, Oxford: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Ltd., 1968; H. C. N. William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nchester: Docuracy Ltd., 2012; H. C. N. Williams, *Twentieth Century Cathedral*, London: Billing & Sons Ltd., 1964; Kenyon Wright, *Coventry—Cathedral of Peace: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loomington: Author House, 2012; Oliver Schuegraf, *The Cross of Nails: Joining in God's Mission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2。

⑤ 有学者在研究南京或其他国际二战殉难城市的和平建设论文中,对考文垂战后和平重建有简略介绍,代表成果是:朱成山、赵德兴、陈俊峰,等:《南京构建国际和平城市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07 年第 1 期;刘成、白爽:《和平学视域下的创建国际和平城市的思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 年第 1 期。其他成果主要是介绍性文章,比如,元丁:《从圆明园到考文垂大教堂》,《世界宗教文化》2001 年第 1 期;施劲松:《毁灭与重生——考文垂大教堂的启示》,《南方文物》2015 年第 2 期;金磊:《用建筑遗产昭示使命——感受英国考文垂新主教堂的创作》,《中国建筑文化遗产》2012 年第 4 期。

径进行系统考察,探究考文垂战后“和平与和解之城”重建模式的主要特点,从和平学视角对战争历史记忆的建构进行反思,揭示战争创伤城市战后和平创建的价值和意义。

一、“和平与和解”理念的提出

考文垂是一座千年古城,因建有隐修院而发展成为繁荣的贸易城镇,14世纪时为英格兰四大城市之一,并在20世纪成为英国军备生产重镇。从1936年开始,考文垂的军备工厂就为战争进行准备,不仅生产侦察车、军用车轮胎、炮弹等传统军备,还生产大量战斗机,为英国皇家空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①。考文垂的军备生产能力为它遭遇德军轰炸种下了诱因,1940年6月至11月,考文垂陆续遭到纳粹的多次空袭,受损程度为当时英国城市之最^②。《纽约时报》报道:“纳粹轰炸机早先想在空袭伦敦中达到的破坏效果在考文垂实现了。面对这座人口仅25万的紧凑小城,德军出动的飞机编队和突袭800万人口的伦敦时所用的一样庞大。”^③空袭造成了考文垂近千人死伤,约75%的工业损毁严重,近5万栋房屋被破坏,基本生活设施几乎毁于一旦^④。

大教堂在1940年11月14日的空袭中被多枚燃烧弹击中葬身火海。据《考文垂电讯晚报》报道:“整个夜晚,考文垂这座城市一直在燃烧,连同她的大教堂一起燃烧,这幅景象象征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人类受苦的时候,上帝也同他们一起在受苦。”^⑤大教堂的尖塔在空袭中得以幸存,“塔尖高耸入云,象征着上帝永恒的威严和爱,它将帮助人们战胜苦难,在永恒的爱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和新的世界”^⑥。

然而,空袭后大教堂迅速作出一个让世人震惊的举动,并由此走上和平与和解之路。1940年11月15日,A. P. 威尔士(A. P. Wales)牧师将三根取自大教堂废墟中的“铁钉”(固定大教堂建筑物之用)捆扎成一个“十字架”^⑦。大教堂教长理查德·霍华德^⑧(Provost Richard Howard)在日记中写道:“这个‘铁钉十字架’的象征意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耶稣的受难,它闪亮的外表预示着复活的喜悦,它对思想和心灵的影响是惊人的、深远的,……是伟大考验和磨难的象征。”^⑨大教堂通过“铁钉十字架”,向德国也向世界主动举起了恢复和平的“橄榄枝”。

考文垂大教堂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在二战中被完全摧毁的圣公会大教堂(Anglican cathedral),德国空军摧毁大教堂被认为是对考文垂这座城市、宗教和英国文化遗产的攻击^⑩。大教堂成为战争中所有深受其害的城市的象征^⑪。因此,1940年(轰炸当年)圣诞节的全国广播(BBC)将大教堂选为播放地。霍华德教长在广播中发表了全球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和平与和解”的理念:“尽管可能很难驱逐所有复仇的念头,但我们正在努力振作起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将世界从暴政和残酷中拯救出来。我们将努力在这场纷争之后的日子里,创造一个更加善良的、更加纯粹的、更像基督——圣婴的世界。我们有勇敢的精神,并祝愿大英帝国有一个勇敢的圣诞节。”^⑫

霍华德教长提出的“和平与和解”理念源于基督教的“宽恕”思想。基督教的原罪说以及由罪而生的苦难的教义,引发出救赎与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强调像耶稣爱人一样爱“邻人”,像耶稣宽恕世人

① Kenneth Richardson, *Twentieth Century Coventry*, Coventry: The City of Coventry, 1972, pp. 66-67.

② Kenneth Richardson, *Twentieth Century Coventry*, Coventry: The City of Coventry, 1972, p. 82.

③ [英]理查德·奥弗里主编:《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1939-1940),钱垂君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363页。

④ Kenneth Richardson, *Twentieth Century Coventry*, Coventry: The City of Coventry, 1972, p. 84.

⑤ “Destruction of Coventry Cathedral: Provost's Tragic Story of Nazis' Shocking Crime”,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Nov 28th, 1940.

⑥ “The Destruction of Coventry Cathedral”,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Nov 22nd, 1940.

⑦ “Cross for Coventry Cathedral: Exhibited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Coventry Standard*, Oct 7th, 1944.

⑧ 理查德·霍华德于1933年—1958年期间担任考文垂大教堂教长。

⑨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25.

⑩ Benjamin Clark, *Memory in Ruins: Remembering War in the Ruins of Coventry Cathedral*,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5, p. 40.

⑪ W. E. Rose, *Sent From Coventry: A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London: Wolff, 1980, p. 11.

⑫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22.

一样宽恕他人,以殉道的方式救赎世人的罪和苦难。正如霍华德教长所言:“在大教堂被毁的那个晚上,考文垂大教堂以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为一个伟大真理的‘现实化身’,即通过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经历困难的人类都可以在复活中获得重生。”^①考文垂主教卡斯伯特·巴德斯利(Cuthbert Bardsley)^②对此评价道:“霍华德凭借着勇气和极具先见的眼光认识到,‘重建后的大教堂会比过去会更为辉煌’。这句大胆而简短的仿若集结号一般的口号传遍了世界,在战争最黑暗的時刻,这句口号为英国和德国占领区的人们带去了新的希望和激励。考文垂这座城市和大教堂不仅给予人类将善从恶中解救出来的决心,还是上帝战胜灾难的象征。”^③德国路德教牧师奥利弗·舒格拉夫(Oliver Schuegraf)则指出,霍华德提出的“和平与和解”理念,是在“仇恨大势”下拉开了大教堂走向和平建设的帷幕。正是“这个在当时不受欢迎的、预言性的宣言,成为大教堂日后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做的一切行动的座右铭”^④。

宽恕不是和解。但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过去发生的罪恶,是一把悬挂在每一代人头顶上的达漠克利斯之剑,宽恕有助于痛苦往事的消解,不可逆转历史的唯一解毒剂就是宽恕的力量。宽恕是一种与过去事件相关的理性过程,人们不需要陷入到事件之中,甚至不需要知道是谁犯下的罪行,即便忏悔性的道歉是宽恕的一个前提条件。人们不忘记过去,又应该宽恕过去,使自己从复仇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从这点来看,宽恕不只是为了对方,更是有利于自我,目的是双方的和解^⑤。图图大主教明确指出:“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⑥

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宽恕”的看法,与西方文化传统“原罪”的价值纬度完全一致。宽恕之为宽恕,奉行的完全是无条件原则与不对等的态度。不但宽恕可以宽恕者,而且宽恕不可宽恕者^⑦。然而,宽恕是一个主观意识的行为,只有受难者才有权利作出决定^⑧。大教堂被炸毁,作为大教堂的代表,霍华德教长有权提出这种基于基督教宽恕思想的“和平与和解”理念。但是,大教堂这种近似“无条件”对德和解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可以代表英国人或者考文垂多数市民的想法。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E. 麦卡洛认为,复仇和宽恕是人类的两种人性,不要试图改变人性,而要改变世界,人类行为基于人性,但可以通过改变环境使激发复仇的因素越来越少,而激发宽恕的因素越来越多^⑨。后来的事实证明,“和平与和解”理念得到了英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考文垂城市也由此发展为国际著名的“和平与和解之城”,这主要得益于大教堂战后贯彻“和平与和解”理念的实践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改变我们人类的社会环境。

二、大教堂的“和平重建”

霍华德教长提出的“和平与和解”理念首先践行在大教堂的“和平重建”上。大教堂的重建象征着考文垂的“重生”,其背后的意义是城市命运和国家精神的重振^⑩。在考文垂遭遇空袭后不久,以重建大教堂作为城市复兴象征的计划立即被提上议程。1941年3月,大教堂理事会决定在现址或附近对大教堂进行重建,并任命一个由霍华德教长担任主席的重建委员会,以“探讨新大教堂的选址、

①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16.

② 卡斯伯特·巴德斯利于1956—1976年期间担任考文垂主教。

③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v.

④ Paul Oestreicher, *The Archangel Michael Takes Wing*,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150.

⑤ Marc Gopin, *Forgiveness as an Element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Religious Culture*, ABU-Nimer M., *Reconciliation, Justice and Co-Existence: Theory & Practic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1, p. 98.

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⑦ 潘知常:《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宽恕”》,“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论文,南京,2005年3月5日,该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⑧ 参见[美]西蒙·威森塔尔《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陈德中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⑨ 参见[美]迈克尔·E. 麦卡洛《超越复仇》,陈燕、阮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V—VII页。

⑩ Louise Campbell, *Architecture, War and Peace: Country Cathedral and the Arts of Reconstruction*,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4.

设计和建筑师任命等”有关问题^①。委员会在战争结束不久便提交了新大教堂的初步设计方案,但该方案未能通过英国皇家美术委员会的同意。1951年,大教堂发起了一场建筑设计竞赛,为新大教堂征集设计方案,并确定了“让新大教堂建筑与旧大教堂废墟遗址共存,新旧建筑间进行对话”的设计理念^②。这意味着,未来的新大教堂不只是修复原样,而且是在保存创伤记忆的同时,推动创伤历史的修复。

为此,重建委员会发布了《参赛者补充指南》(*Supplementary Guidelines for Competitors*),要求参赛者必须是1925年以前出生的英国公民,这意味着参赛者们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有着刻骨的感受,而这将有助于参赛者们更好地理解考文垂对于英国国家重建的象征意义^③。最终,巴兹尔·斯宾塞(Basil Spence)的参赛作品脱颖而出,被选为新大教堂的建筑设计方案^④。1956年,重建工作正式启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为新大教堂奠基,1962年新大教堂落成。

霍华德教长的继任者H. C. N. 威廉姆斯^⑤(H. C. N. Williams)认为,新大教堂建筑的设计有一个重点——要从“仇恨中走出来”。新大教堂是集体记忆的承载物。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它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往往依赖于文化创伤的形成,而这种创伤中的“历史教训”又被沉淀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历史纪念物之中。记住历史而不是仇恨,应该是所有战争纪念场所的重要原则。斯宾塞的设计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注重参观者的“戏剧性的体验”^⑥。新大教堂建筑完整保留了旧大教堂遗址(大尖塔和残垣),在遗址旁侧建造了一座新建筑,空旷区域被设计成一个花园广场。遗址部分代表“牺牲”“创伤”,新建筑寓意“重生”“希望”。两座建筑物之间通过门廊相连接,门廊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象征“从冲突的痛苦和悲伤,走向和平与宽恕的旅程”。站在遗址望向新建筑,辉煌宏伟的新建筑带给人新的“希望”,如同耶稣在承受了磨难后的重生;站在新建筑入口回望遗址,断壁残垣之象让人铭记战争带来的灾难。

旧教堂遗址与新建筑的“并列呈现”也表达了“善”与“罪”的二元对立。人类的自私和邪恶犯下的“罪”令古老的大教堂变成废墟。新大教堂是人类战胜邪恶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战胜了邪恶,人类才能重新拥有“辉煌”。因此,未来的“行善”是建立在“认识到邪恶”的基础之上。为了强调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在新教堂的外墙上还铸有著名的雕塑作品“圣米迦勒大战恶魔”铜像。

但是,正义、真相、宽恕都是和解的核心要素。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得到同情和确认。真相与宽恕可以同向而行,但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是需要接受的观点。正义对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涉及利益、重建和补偿,但它又与和平相连。和解需要合适的空间,空间又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维度,它既代表一个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又代表了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传输的重要载体^⑦。约翰·保罗·莱德里奇(John Paul Lederach)认为,和解事实上是一种相互依存思想和力量,它意味着创建一个空间,使冲突各方在那里会面,彼此关注双方的关系并分享感知和经验,进而创建新的感知和分享新的经验^⑧。

大教堂的和平行动为英德之间的和解打开了通道。1958年,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宣布要与考文垂大教堂进行和解,并捐赠5000英镑用于新大教堂统一礼拜堂(Chapel of Unity)的建造。媒体纷纷报道豪斯总统的访问,多份报纸刊登了有关

①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p. 27-29.

② Robert Bevan, *The Destruction of Mem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p. 191.

③ Louise Campbell, *Architecture, War and Peace: Coventry Cathedral and the Arts of Reconstruction*,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ation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14.

④ Ambrose Hogan, *Coventry Cathedral and the Theatre of War*, London: Things, 1998, p. 19.

⑤ H. C. N. 威廉姆斯于1958-1981年期间担任考文垂大教堂教长。

⑥ Ambrose Hogan, *Coventry Cathedral and the Theatre of War*, London: Things, 1998, pp. 8-9.

⑦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⑧ John Paul Lederach, *Building Peace: Sustainable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7, pp. 29-30.

“宽恕与遗忘”的主题文章,而该主题成为大教堂未来十年和平建设的重心^①。1962年,大教堂再次收到联邦德国政府5000英镑捐款,用于修建大教堂国际青年旅社^②。作为回馈,大教堂开始积极计划并推进德累斯顿(当时隶属东德)女执事医院的重建项目。在世界冷战格局影响下,英国与东德之间的城市交往活动受到诸多限制,考文垂的志愿者在1965年才抵达德累斯顿,项目最终的完成非常不易。该项目也被认为是战后大教堂最复杂且成功的一次对德和解的尝试^③。上述行动,使大教堂成为英国对德和解当之无愧的“先锋”。

威廉姆斯教长在回忆录中写道:“大教堂的建造花费了75万英镑,大约是一架轰炸机成本的八分之一,是一个氢弹的零头。……今天,人类也是悲剧的一部分,人们把更多的钱花在了战争和防御战争上。……大教堂与其他宗教中心一样,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美好事物的信仰,它是一种更高价值的信仰宣言,高于国与国的猜忌和仇恨所呈现出的价值。”^④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如同陪审团制度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发明”。在陪审团制度诞生前也有其他的审判方式,比如拷打和格斗。但当老的“发明”遭到质疑时,它就要被新“发明”所取代。如果人们对战争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感到绝望,那么就应该用一种新的发明来取代它^⑤。毫无疑问,大教堂的和平建设正促进着一种新“发明”的诞生——用非暴力方式实现冲突转化。根据和平学的理论,和平不仅是所有形式的暴力的缺失或减少,更是采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冲突转化,使和平绽放出更多活力。

威廉姆斯教长认为:“古老的大教堂在仇恨中被摧毁,基督徒们不能让仇恨造成的伤口始终不愈。人类的希望会因为这样的行为,被钉死在世界舞台的十字架上。宽恕、和解和复活必须上演。每一次的仇恨、痛苦和毁灭行为都会让人类面临两种结局,要么将仇恨和痛苦埋葬,竖起纪念碑以免被人遗忘;要么从这些坟墓中走出来,让希望再次升起。第一个选择肯定会使仇恨和痛苦再次降临,后者则会使人确信,希望的愿景将变得更加光明,仇恨的力量会被削弱。”^⑥坚持向前看也许是最好的一个和解方式。但是,真相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解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处罚应该适用于将过错方整合进来的修复性正义,而不是进行报复。事实证明,大教堂的和平行动不仅驱使了德国人对战争罪责的承认,而且唤起他们对罪责行为进行补偿的责任意识。

大教堂的“和平重建”向世人展示并阐述了“和平与和解”理念的内涵及功效。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员。大教堂利用基督教传统的教义思想,围绕人类的本质问题进行回应^⑦。有人甚至认为,“在基督教世界,没有一个战争纪念场所能与之媲美”^⑧。

三、大教堂的积极和平行动

在大教堂“和平重建”的同时,英德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和平重建”。在此过程中,大教堂利用自己的国际声誉,凝聚更多人参与到促进世界积极和平的行动中来。正如巴德斯利主教所言:“大教堂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际和解中心,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依赖,以及世界与我们之间的团结关系,考文垂和这个教区的人民要开始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世界。”^⑨为此,战后大教堂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和平与和解”的实际行动,推动考文垂迈向积极和平的发展道路。积极和平是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⑩。

① H. C. N. William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nchester: Docuracy Ltd., 2012, pp. 147-158.

② “Cathedral Receives Germans’ Gift”,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Dec 21st, 1962.

③ Oliver Schuegraf, *The Cross of Nails: Joining in God’s Mission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2, pp. 29-35.

④ H. C. N. Williams, *Coventry Cathedral in Action*, Oxford: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Ltd., 1968, p.2.

⑤ Margaret Meadren, *Warfare Is Only an Invention-Not a Biological Necessity*, David P. Barash, *Approaches to Peac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22.

⑥ James D. Herbert, “Bad Faith at Coventry: Spence’s Cathedral and Britten’s War Requiem”, *Critical Inquiry*, 1999, 25 (3), pp. 546.

⑦ H. C. N. Williams, *Coventry Cathedral in Action*, Oxford: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Ltd., 1968, p.2.

⑧ Benjamin Clark, *Memory in Ruins: Remembering War in the Ruins of Coventry Cathedral*,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5, p. 39.

⑨ Coventry Cathedral, *A Souvenir Publication: to Commemorat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Consecration of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Michael, Coventry*, Leamington Spa: English Counties Periodicals Ltd., 1963, p.15.

⑩ 刘成:《和平学》,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大教堂的和平行动从修复英德关系和弥合战争创伤开始。1946年,霍华德教长与德国汉堡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牧师在英国圣诞节全国广播中进行对话,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德神职人员首次在公开场合进行互动^①。在对话中,霍华德教长强调:“基督宽恕的精神可以充满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原谅所有对我们犯下错误的人,我们也祈祷,我们所做的错误都能够被原谅。……有一种新的精神即将诞生,新的勇气、新的信仰、新的无私、新的对彼此痛苦的怜悯……”^②对于英方代表霍华德教长的友善态度,德方的梅克伦堡牧师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在考文垂的兄弟。……你的‘宽恕’和‘新生’唤醒了我,在我心中回响,‘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他人的罪过’,但愿这些话能在所有人心中回响。只要我们能驱除怨怼和仇恨,重新开始,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你们的和我们的孩子——就能和平地、像兄弟一般地生活在一起。”^③在这场堪称“英德战后和解宣言”的对话中,大教堂成为“将敌意转化为友谊的标志”^④。

“友好城市”模式的推广是大教堂积极和平行动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友好城市”是从大教堂“和平与和解”的理念出发,促进考文垂与其他战争创伤城市之间进行和解互助、友好联谊的一种城市外交(公共外交)模式。在此之前,虽然已有城市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或合作的先例,但是,考文垂是世界上第一座系统性实施“在城市之间建立稳定、正式关系”政策的城市。

1947年9月,考文垂市长、大教堂霍华德教长、城市商贸机构代表等一行人访问基尔^⑤。此次访问促成考文垂与基尔“友好城市”的缔结,这也是考文垂战后缔结的第一座“友好城市”。这次联谊行动是战后英德城市间的首次正式交往,极具特殊的“和解”之意。在基尔期间,霍华德教长反复强调“友谊才能在两国之间形成新的纽带”^⑥。一次公开会议上,霍华德表示:“考文垂和基尔的人们都在渴望对城市物质和文化的重建,这种重建最终取决于我们的精神资源。对过去罪过的真诚忏悔,对真善的憧憬,以及对彼此苦难的同情。”^⑦前期与德国教会之间的多次和平对话,使“对过去罪过的真诚忏悔”的观念更容易被德国人所接受。此行,大教堂向基尔圣尼古拉教堂赠出了象征着和解的“铁钉十字架”,作为回馈,圣尼古拉教堂在其被轰炸后的废墟中挑选了一块石头赠与大教堂,现陈列于大教堂内,被称为“基尔宽恕之石”^⑧。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很多的无辜民众也遭受了战争的伤害,在基督教教义的原则下,这些民众同样需要“宽恕”那些伤害了自己的人。

20世纪40到50年代,在大教堂的参与下,考文垂与基尔、利迪策、德累斯顿等多座战争创伤城市建立起“友好城市”关系。1955年,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⑨将考文垂评选为“最能体现欧洲理念(European Idea)”的城市^⑩。同时,为表彰考文垂创建的“友好城市”模式在推动战后欧洲国家友好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授予考文垂“欧洲委员会欧洲奖”^⑪。

但是,彼时英国反德情绪依旧高涨,一些英国媒体在报道中抨击德国政府对大教堂的捐款是“赎罪金”^⑫。对此,只有通过不断扩大英德之间的和解才能消解英国人的愤恨。1960年,大教堂与西德“和平与和解行动”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双方派遣志愿者前往彼此国家参与当地的重建工作。1961年,16名德国年轻志愿者抵达考文垂,帮助大教堂重建了在轰炸中被毁的法衣室,并将其改造为新大

①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87.

② “Radio Links Bombed Cities: Coventry Says it with ‘Forgiveness’”,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Dec 27th, 1946.

③ “Radio Links Bombed Cities: Coventry Says it with ‘Forgiveness’”,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Dec 27th, 1946.

④ Michael Sadgrove, *Theology, Worship and Spirituality*,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53.

⑤ “Stupendous Ruin That was Kiel”,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Sep 24th, 1947.

⑥ Oliver Schuegraf, *The Cross of Nails: Joining in God’s Mission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2, pp. 26–27.

⑦ W. E. Rose, *Sent From Coventry: A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London: Wolff, 1980, p. 17.

⑧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88.

⑨ 欧洲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5月,旨在推动欧洲城市间友好关系的建设。

⑩ Kenneth Richardson, *Twentieth Century Coventry*, Coventry: The City of Coventry, 1972, p. 326.

⑪ “European Prize”, *Consultative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ct 14th, 1995.

⑫ W. E. Rose, *Sent from Coventry: A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London: Oswald Wolf Ltd., 1980, p. 53.

教堂的国际中心^①。英国媒体报道此举是“一项源于和解的崇高行动”^②。

“历史不会自动代代相传,而是必须被积极主动地传递,这样后人才能将那段历史视为有意义的历史。”^③但是,“负面情绪的记忆是道德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这一观点在很多和平或战争纪念馆的记忆传递中得到体现。这些场馆通过讲述痛苦的战时记忆,唤起参观者强烈的反战情绪,使后人鲜活地保持这类原始情感记忆的能力^④。尽管这种战争纪念方式的目的在于宣扬“战争的不在场”和警醒后人,但“狭隘”的历史传递往往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包括过分强调自身“受害者”的形象^⑤,或是利用“恐惧”“胆怯”这样负面情绪让人们抵触战争。此类战争纪念方式是一种“被动的”消极和平^⑥的构建。然而,战争记忆研究正在发生三个维度的变化:英雄记忆转向创伤记忆,战胜国的记忆转向所有创伤国的记忆,国家的历史记忆转向多国共享的历史记忆。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人类不懈努力地追求和平,和平的记忆终将超越战争的创伤记忆。

大教堂作为英国战争殉难的代表性记忆场所,是考文垂战争记忆传递的重要媒介,而和平教育则是大教堂进行战争历史传输的主要途径。新大教堂建成后,访问大教堂的学童人数大幅增加。1963年,每日约有6000名孩子在大教堂接受战争与和平主题的课程学习^⑦。据英国教育部门年度报告显示,1965年10月至1966年9月,来自英国各地的364所学校参观过大教堂;1989年以来,每年约有1万名学童参观大教堂,在学习战争历史的同时,体悟大教堂和平建设所践行的“和平与和解”理念^⑧。同时,大教堂针对学前和小学生群体开设了“属于我们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 Belongs to Us)专题课程^⑨。在为期三周的课程中,大教堂的教育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授大教堂的历史、建筑、和平符号、艺术陈列品等其中承载的深刻内涵^⑩。因此,大教堂成为英国重要的和平教育基地。

1973年,大教堂与兰彻斯特理工学院(现考文垂大学)合作建立了和平研究中心^⑪。1974年6月4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亲自为研究中心揭幕。对于建立该中心的意义和目的,《泰晤士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评价:“‘和解’这个主题,最初只是简单的为表达治愈二战创伤的愿望而提出,现在已经被带入社会和政治理论领域。……研究人员相信,基督教可以为分裂的社会提供一些东西,而不是用礼貌的善意或仁慈的家长制来掩盖分歧。这种‘更多’的东西尚未明确出现,但当它出现时,它将在昨天开幕的新研究中心内形成。”^⑫和平是需要通过教养和培育才能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每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追求和平,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暴力更少”^⑬。

和平符号的构建与传播是大教堂传递战争记忆的另一重要途径。具有公共属性的纪念物,不仅承载着营造者一开始设定的纪念内涵,还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在经历长时间的积淀后,也会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凝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认同”^⑭。“铁钉十字架”是大教堂使

① “Royalty, Generosity, Gifts and a New Marine Uniform”,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Oct 14th, 1961.

② “Royalty, Generosity, Gifts and a New Marine Uniform”,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Oct 14th, 1961.

③ Timothy G. A., Graham Dawson, Michael Roper, *The Politics of War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Contexts, Structures and Dynamics*, Timothy G. A., Graham Dawson, Michael Roper, *Commemorating War: The Politics of Memory*, 2017, London: Routledge, p. 44.

④ [美]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李鹏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12页。

⑤ 譬如日本的和平纪念馆在实际的展览主题设置和功能发挥方面就存在强化“被害”意识,较少涉及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参见孙晓光、刘成:《战后日本的“和平纪念”与和平建设——以日本和平博物馆为中心》,《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

⑥ 消极和平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避免武力,通过谈判、调解等手段解决争端,这种和平由于只强调拒绝直接暴力,没有触碰冲突问题深层的核心症结,因此,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短期的和平。参见王梦:《试析加尔通和平思想的价值与局限》,《学术交流》2015年第11期。

⑦ “Traders Report Busy Holiday in Coventry”,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ul 19th, 1963.

⑧ Margaret Sedgwick, *Reaching out in Mission and Ministry*,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p. 98-100.

⑨ Margaret Sedgwick, *Reaching out in Mission and Ministry*,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98.

⑩ “Child's View of 'Our Cathedral'”,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un 19th, 1979.

⑪ Margaret Sedgwick, *Reaching out in Mission and Ministry*,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p. 91-93.

⑫ H. C. N. William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nchester: Docuracy Ltd., 2012, p. 130.

⑬ [美]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刘成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550页。

⑭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31页。

用最多的和平符号。

“铁钉十字架”最初作为“记载”大教堂战争经历、推广“和平与和解”理念的“信物”,被大教堂广泛赠送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家代表、教会等。仅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有上百个“铁钉十字架”被赠出,丘吉尔与夫人(1941年)^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6年)^②、玛格丽特公主(1957年)^③等都曾获赠“铁钉十字架”。随着“铁钉十字架”的广泛传播,大教堂开始将其作为国际“和解”的媒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和平活动,包括上文提及的德国基尔、德累斯顿,还有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格勒、荷兰的鹿特丹等城市都曾得到获赠。1961年,威廉姆斯教长前往德国汉堡进行访问,将一个“铁钉十字架”作为“和解之礼”赠送给当地的圣凯瑟琳教堂,当时《考文垂电讯晚报》称“这枚‘铁钉十字架’象征着与德国人民的友谊”^④。

大教堂“铁钉十字架”的影响力不断超越英德和解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初期,威廉姆斯教长萌生“要在一个国家的基督徒和另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的想法^⑤。1964年,大教堂起草了《共同纪律》,并在会众中进行推广^⑥。随着自愿遵循该纪律的会众人数不断增加,大教堂提出构建一个以“铁钉十字架”为象征符号,以遵守《共同纪律》为基本要求,以“和平与和解”理念为共同信仰,以“治愈历史创伤”为一致目标的和平行动团体,并命名为“铁钉十字架社区”(The Community of the Cross of Nails)^⑦。“铁钉十字架社区”迅速向国际范围扩张,“社区”成员们“本着耶稣‘爱你的敌人’的教导,积极应对因激烈冲突而对个人、社会和经济所造成的创伤,致力于解决由宗教、种族和民族差异造成的分化和敌视”^⑧。

随着“铁钉十字架社区”的发展,其和平建设目标已经大大超越大教堂此前关注的“对德和解”“战争治愈”等议题,开始向环境、种族、宗教等基于人类基本需求的冲突领域推进。如推动致力于欧洲和解与统一的“欧洲愿景”(Vision of Europe)项目^⑨、举办关注全球生态和平问题的“生态与基督教的责任”国际会议^⑩、派遣团队前往北爱尔兰“促进当地分裂的宗教阵营之间的和解”^⑪等。目前,“铁钉十字架社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200多个和平合作伙伴,将世界各地的教堂、慈善机构、和平组织等串联在一起。2009年,大教堂利用“铁钉十字架社区”平台,启动“国际铁钉十字架学校”(International Cross of Nails Schools)项目,构建起国际化和平教育网络。该项目将世界各地的中小学纳入“校园社区”内,为这些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和平教育课程,旨在培养更多年轻一代投入到未来世界的和平建设中。

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突出表现,使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开始充当国际和平“调解者”的角色,参与国际冲突事件的化解工作。以巴以争端调解为例,2002年1月,在大教堂的支持下,国际和解中心时任主任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教士召集了一批来自巴以两国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高级宗教领袖,在埃及亚历山大市举行了会议,探讨地区的和平前景。会议签署了《圣地宗教领袖亚历山大第一宣言》(First Alexandria Declaration of the Religious leaders of the Holy Land),此宣言获得了巴以两国领导人的认同。宣言中明确承诺“继续共同寻求公正的和平”,呼吁在宗教的

① “A Cross of Three Nails Made from the Ruins of Coventry Cathedral”,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Oct 4th, 1941.

② “Cathedral Stone to be Laid by Queen”,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an 9th, 1956.

③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81.

④ “Cathedral Nails Symbol for Hamburg”,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an 30th, 1961.

⑤ Coventry Cathedral, *A Souvenir Publication: to Commemorat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Consecration of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Michael*, Coventry, Leamington Spa: English Counties Periodicals Ltd., 1963, p. 44.

⑥ 《共同纪律》,又称《考文垂纪律》,该纪律条款由大教堂撰写,适用于个人或社区,旨在为基督徒在祈祷、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个人成长等方面提供指导。see to H. C. N. William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nchester: Docuracy Ltd., 2012, p. 126.

⑦ Kenyon Wright, *Coventry—Cathedral of Peace: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in Inter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loomington: Author House, pp. 57—58.

⑧ 施劲松:《毁灭与重生——考文垂大教堂的启示》,《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⑨ “Cathedral sermon by Catholic”,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un 29th, 1967; “Europe Week Welcomed by Brown”,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May 9th, 1967.

⑩ “Provost’s Tennessee Talks”,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an 24th, 1975.

⑪ “Coventry in Ulster”,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Apr 20th, 1972.

支持下停止战争^①。

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到经济衰退期,经济滞胀的“英国病”出现了。考文垂高度依赖制造业,70年代时,城市的制造业从业人员达到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过度单一的产业结构使考文垂在去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急速衰退,失业率远高国家平均水平^②。1975年,英国失业人数已超过100万,1978年达到160万^③,大量传统工业城市遭受巨大冲击。劳资冲突、种族歧视、贫民数激增等社会矛盾充斥着考文垂。面对城市危机,大教堂表示要在从未经历过的急剧社会转型中承担起更多“社会需求给予的责任”^④。

面对城市工业领域的冲突问题,大教堂一是为工人们提供宗教礼拜服务,派遣工业牧师在教区内进行广泛传教,加强对城市工人群体的了解^⑤;二是成立考文垂“工业布道团”,定期对城市工厂进行访问,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协助工厂解决劳资冲突、工人培训、失业就业等问题,力图化解隐藏于城市工业发展中的各类根源性矛盾冲突^⑥;三是组织、举办各类城市工业研讨会、民众集会等,引发人们对城市工业领域冲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⑦。

战后繁荣发展时期涌入的大量移民劳动力在城市出现急剧衰退后被白人人群体视为对自身“生活和工作保障的重大威胁”,城市内的种族冲突不断激化。大教堂呼吁民众要认识到“考文垂是一个多种族社区”的事实^⑧,要理解、接纳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⑨。与此同时,大教堂成立了“考文垂社区关系委员会”(Coventry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任命专职种族关系牧师,处理紧张的城市种族冲突问题^⑩。大教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市民提供相互了解、和平共处的机会。因此,大教堂被称为是“所有种族的理想聚会场所”^⑪。

面对城市综合性问题,大教堂在1968年举办了“人与城市”主题会议,邀请经济、社会、规划等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人士参会,共同商议当代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⑫。同年,考文垂成立了英格兰第一个“大教堂城市研究中心”^⑬。该中心的工作目标即“努力改善城市生活,促使在城市问题上达成共识,或使‘分歧’成为创造性的意见”^⑭。不仅如此,中心还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问题的城市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如对新工业城市杜尔加普尔的产业发展问题、加尔各答的经济冲突问题等进行研究^⑮,并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

大教堂在积极推进国际和平与和解事业的同时,利用自身的宗教和社会公信力,主动承担起城市本地的和平建设任务,将“和平与和解”理念贯穿到世俗社会各领域建设之中,体现了大教堂对实现积极和平的强烈追求。

① Oliver Schuegraf, *The Cross of Nails: Joining in God's Mission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2, pp. 153-155.

② Clive Collis, *Recession and Relative Recovery*, Jason Begley, Tom Donnelly, David Jarvis, et al, *Revival of a city: Coventry in a Globalising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94-99.

③ 钱乘旦、陈晓律、潘兴明,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2页。

④ “Provost on Church's Need for Language which is Understood”,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Oct 5th, 1963.

⑤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p. 79-80.

⑥ Margaret Sedgwick, *Reaching out in Mission and Ministry*,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83.

⑦ Margaret Sedgwick, *Reaching out in Mission and Ministry*, Christopher A. Lamb, *Reconciling People: Coventry Cathedral's Story*,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11, p. 95.

⑧ “Accept Multi-racial Natural of City-Bishop”,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May 27th, 1978.

⑨ “The Threat of Race Violence in the Uneasy Peace”,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an 2nd, 1970.

⑩ “Keeping in Step with a Modern World: Impetus”,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May 24th, 1972.

⑪ “An Act of Unity”,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Aug 9th, 1965.

⑫ “Coventry World Conference on City Dwellers”,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Jan 24th, 1966.

⑬ “Keeping in Step with a Modern World”,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May 24th, 1972.

⑭ “Training”,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May 24th, 1972.

⑮ “Training”,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May 24th, 1972.

四、大教堂对城市发展之审思

综上所述,战后大教堂和平建设践行的“和平与和解”的非暴力理念,促使考文垂摆脱受难者的叙事模式,引领了战后城市的发展方向。在“考文垂大轰炸50周年”的考文垂政府文件汇编中,有一份题为“通往和平的道路”(The Path Towards Peace)的报告中写道:“大教堂被毁的象征意义向考文垂的人民和神职人员展示了死亡和重生的概念,这为考文垂的未来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路。”^①

考文垂被轰炸后,德国纳粹曾将其视为“全面战争典范”的标志事件,柏林宣传机构专门创造了一个新词“Coventration”(意为:夷为平地),以此描述被轰炸后的考文垂惨况^②。“Coventration”一词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威吓性的战争宣传,随着纳粹的败退该词在德国就甚少使用了。然而,这个词却长期被反法西斯国家作为坚强不屈的象征用以宣传。大教堂的国际募捐广告中也使用了“Coventration”,认为该词是“考文垂和大教堂受到破坏的必要提醒”^③。更为重要的是,大教堂的和平建设赋予“Coventration”全新的“重生”寓意,即“用和平与和解的方式治愈战争创伤”^④的城市重建模式。

和解是弥合创伤最好的方式,“考文垂大轰炸”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间,尽管有人试图重拾仇恨,但大教堂依旧在英德和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⑤。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安德鲁·瑞格比(Andrew Rigby)教授认为,和解“要求相互敌视的各方能够积极参与其中,人们做好共同勾画未来的准备是任何和解过程的关键。为此,他们可以不要忘记过去,但应该宽恕过去,在这个基础上携手共进”^⑥。大教堂在遭遇空袭后迅即提出“与敌人和解”,这种“和解”不是无视历史,也不是放弃真相和正义,而是用宽恕打开和解的大门,促使“加害者”承担责任,激发考文垂战后城市重建的生机。大教堂彰显基督教宽恕思想的“和解口号”,落地为一贴加速考文垂“和平与和解之城”建设的促进剂。与此同时,一个由大教堂、考文垂市议会、考文垂大学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和平建设领导机制形成了,并唤起国内外个人和团体对该城和平建设的广泛参与和援助。在践行“和平与和解”理念的历程中,大教堂增强了城市建设力量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形象。

考文垂作为一座创伤城市,其战后发展承负国际和解的重托,而和解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充满理解和希望的积极关系。在和解进程中,考文垂超越了战争的政治记忆(political memory),促进公众“共同记忆”的生成。考文垂的和解经历表明,治愈创伤的最好方式不是揭开疮疤,用和平的话语和记忆符号去传播创伤记忆,更有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共鸣,避免过去伤痛历史制约现实的发展。

当然,考文垂大教堂的和平与和解之路具有宗教教义的意味,但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理念及其实践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其对考文垂构建“和平与和解之城”的贡献得到了国际认同。事实表明,人类开始战后的和解进程(可能)比发动一场战争更困难,和解往往很难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结果^⑦。为此,考文垂的和平城市建设,为其他国家创伤城市的战后重建和发展、国家间的和解提供了一种有益参照。

(责任编辑 卢 虎)

① “‘Forward in Friendship’ press pack for Blitz Commemoration; The Path Towards Peace”, 1990, CCB/8/1/5/1, Coventry Archives & Research Centre.

② R. T. Howard, *Ruined and Rebuilt: The Story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39—1962)*, Coventry: The Council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62, p. 19.

③ Stefan Goebel, *Commemorative Cosmopoli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f Remembrance in Post-War*, Stefan Goebel, Derek Keene, *Cities into Battlefields: Metropolitan Scenarios, Experiences and Commemorations of Total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65.

④ H. C. N. William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nchester: Docuracy Ltd., 2012, p. 242.

⑤ “Cathedral’s Part in Reconciliation”, *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Nov 15th, 1961.

⑥ [英]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⑦ 刘成、[德]埃贡·施皮格尔:《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9页。